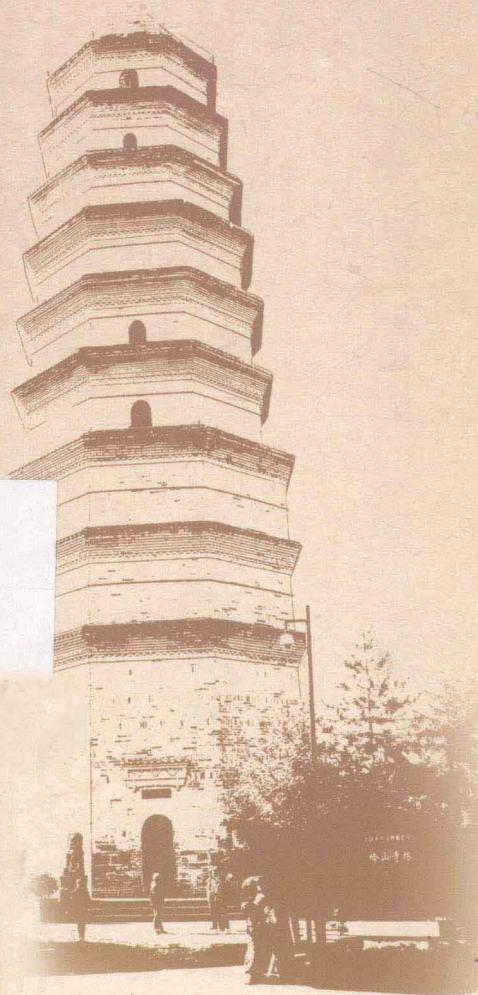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延安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高九江 韩琳 著



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延安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高九江 韩琳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责任编辑:吴继平

装帧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高九江 韩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

ISBN 978 - 7 - 01 - 012900 - 6

I. ①延… II. ①高…②韩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
研究-中国- 1935~1948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5872 号



高九江 韩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75

字数:258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2900 - 6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2
二、研究意义	13
三、研究内容	15
四、研究方法	18
第一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条件	20
一、历史条件	20
(一)延安时期的历史特点	21
(二)延安时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的 历史契机	23
二、实践条件	29
(一)两次内战时期革命斗争实践的经验教训	29
(二)抗日战争革命斗争实践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36
三、理论条件	38
(一)前延安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认识	39
(二)延安时期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认识	43
四、文化条件	46

(一)“中国化”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46
(二)延安时期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关系的科学认识	49
五、精神条件	54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神条件的形成	55
(二)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精神动力	58
六、主体条件	64
(一)中国共产党臻于成熟	65
(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	68
(三)建立了一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 队伍	72
第二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84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奠基	84
(一)瓦窑堡会议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轫 ...	86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经验教训的军事哲学总结	88
(三)《实践论》、《矛盾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哲学基础	93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面展开	103
(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任务	103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方面展开	113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教育	116
(一)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教育运动	117
(二)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程	121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纲定位	131
(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确认	132
(二)中共七大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135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推进	140
第三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141
一、深入持久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142
(一)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运动的兴起及其经验	142
(二)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运动对推进中国化理论 创新的意义	154
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伟大的创新成果	157
(一)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确立	158
(二)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的成熟	163
(三)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	195
三、中国化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成果	199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	200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实质	202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	204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	206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竭动力	208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永恒发展	209
第四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212
一、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	212
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214
(一)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把“坚持”和“发展” 统一起来	214

(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不断推动思想解放	216
(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走适合于中国自己的道路	219
(四)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中国国情	221
(五)必须加强理论创新,不断推出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224
(六)必须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26
(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使其成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229
(八)必须端正学风,大力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	232
(九)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集体智慧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34
第五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启示	238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演进	238
(一)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	239
(二)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推进	244
(三)继续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汲取延安时期的经验启示	250
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启示	252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化”的方向不能动摇	252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	256
(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须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261

(四)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必须把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到“中国化”的全过程	263
(五)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反对教条主义	267
(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70
(七)积极开展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73
(八)反对脱离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与时代化相统一	278
(九)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在排除“左”和右的干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82
第六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评价	285
一、国内外评价概述	285
(一)国外评价述要	286
(二)国内评价鸟瞰	289
二、科学评价刍议	292
(一)巨大成就	292
(二)历史地位	295
(三)当代价值	297
三、有待研究的问题	299
参考文献	312
后记	320

导 论

所谓延安时期,是指中共中央、毛泽东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1948年3月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形势下,东渡黄河前往华北,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长达13年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毛泽东思想得以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辉煌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就是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进而指导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过程。

今天,站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起跑线上,回溯延安时期,探索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演变、发展及其规律,对于揭秘历史,昭示未来,不断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概述

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很多,但直接研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著作和论文较少,而专门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著尚未见到。目前,我们只能在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中,看到一些有关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零散的思想观点。由于其意识形态、知识背景和研究范式的影响,他们的许多观点存在着严重不足,甚至自相矛盾,谬误百出。但是,他们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也不乏真知灼见,实际上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可以说,斯诺是最早认识到并报道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西方人。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陕北采访毛泽东的一系列报道,使西方人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看到了马列主义被“改动”而成为适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了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过是莫斯科操纵下的傀儡的论调。他写道,采访毛泽东的个人历史,使我“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①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深受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但是,“俄国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经大加改动以适应具体环境而仍存在下来的。十年的实际经验消灭了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进口的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做法,结果也造成苏维埃制度中带有完全是中国式的特点”。^① 这里所说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和“中国式的特点”,实际上讲的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

继斯诺之后,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史华慈等开始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也论及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诺曼·莱文在其《辩证法内部对话》的第六章《辩证法与延安道路》中认为,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中国化的要求在正式文件中,可以说在三年前即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就开始有所体现了。然而,莱文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就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来的。莱文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就有的看法,有其合理性,但认为它不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来的观点,则不可思议,不能认同。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施拉姆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命题,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来的,但其基本思想酝酿已久。他明确地指出,“它所表达的内容在1938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② 施拉姆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或口号的使用情况,他说:这个口号的使用“始于1938年,那时,毛泽东第一次使它成为自己的口号;这一时期在1945年达到顶点,这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为毛泽东在创立既是彻底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真正中国式的理论方面所取得的巨大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页。

^②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成就而欢呼”。^①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但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毛泽东所思考的主要问题。这一口号所表达的内容，“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它就不仅仅是存在下来了，实际上，它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②

关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价值意义，虽然有西方学者持否定意见，但大多数学者则给予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

如，美国学者斯特朗在《毛泽东思想》一书中写道：“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的形式变为亚洲的形式。”

罗斯·特里尔指出：“毛泽东用来说服马克思主义思想要适合中国的情况的一个术语——‘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颇不寻常的运用。”^③

雷蒙德·怀利讲道：“1938年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然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史上最有吸引力的话题之一。”“尽管他的倡议激起了反对的意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对于毛泽东取得党内意识形态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极大的价值。”^④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他后来在理论和实

①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②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③ [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胡为雄、郑玉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④ [美]雷蒙德·怀利：《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林育川译，《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

⑤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践上的最大成就。”^①

美国学者德里克说：“在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包含的所有革新中，没有什么比他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或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根本，更为意义深远了。在把民族目标和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这一点上，毛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它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做法不仅对中国革命而且对全球范围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意义极为深远的。”^②

日本学者德田教之认为，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通过强调重视‘中国化’这一作为思想方法和表现方法的‘民族形式’，来批判党内的‘西方影响’、‘空虚抽象的东西’和‘教条主义’，企图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定向。……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国化’问题，可以理解成他不是仅仅把自己看作是斯大林的忠实学生，而是为提出一种积极地寻求‘中国之路’的独立意识形态开辟道路”。^③

有趣而令人费解的是，许多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价值意义作了客观公允的评价，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之核心的苏联及斯大林却对这个命题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长期持疑虑和否定态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指出：“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对于苏联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普遍规律不论对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是一样的”。

^①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② 转引自成龙：《国外毛泽东历史遗产30年研究述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96—97页。

2.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对此怎样理解，西方学者给出了不尽相同的回答，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儒化论。在西方学者中，以费正清、列文森、罗兹曼等汉学家为代表，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看成是“被儒学思想方法的同化”。他们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只是儒学传统思想的改头换面的延续。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也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口号，就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把马克思主义“冲得烟消云散”了。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化，也就是“儒化”。这种观点不仅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且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了主观臆断的错误解读。

二是质变论。施拉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的中国化，虽然在毛泽东看来必不可少的，却只是一项更为重要的事业的外在表现，这种事业的目标是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以便使之适合中国的环境。”^①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作为一种口号，在民族危急关头用来迎合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②按照施拉姆的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使马克思主义发生质变，以便“迎合非马克思主义”。这显然是大错特错。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使马克思主义质变为非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要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①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②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5页。

三是异端论。1948年,美国“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最先提出了“异端论”,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包含任何马列主义的成分,它所遵循的只是中国革命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费正清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特殊的”,因为它“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毛泽东不但偏离了“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偏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1951年,美国著名学者本杰明·史华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这部论著中,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这个词,他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独特的创造,实际上背离或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这种“异端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歪曲。

四是权力论。西方一些学者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内权力之争联系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的一个花招,旨在同紧跟莫斯科的留俄派进行的权力斗争中抬高自己的地位。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就指出,毛泽东最初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主要是要使中国共产党对问题的处理能够适应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这种评价毋庸置疑是正确的。但是,施拉姆接着说,“在1941—1943年,他这一思想在发展中又出现另一个主要方面,那就是它更为直接地与毛泽东同党内对手们的斗争联系到了一起,他宣传的那些观点明确地被用来为他在斗争中的利益服务”。^①罗伯特·诺斯在《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更为直白地指出,毛泽东“修改了俄国的共产主义政治理论,以适应中国的特殊需要,并便于他本人登上权力宝座”。这种“权力论”的观点,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①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五是结合论。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隐喻的外衣，用中国的例子来阐述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与从中国历史和哲学传统中挑选出来被认为是‘进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相结合，那么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便是对整个中国文化进行现代化以及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① 在这里，施拉姆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把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的要求相结合。这种“结合论”，虽然正确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个“中国化”的本质。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从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文中指出：“中国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去揭示反映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特殊‘规律’。”“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同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相结合。”^② 奈特的这种看法比较贴近实际，就其基本精神来看，与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致的。

六是民族主义论。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形成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③ 日本学者德田教之指出，“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法，……提出了理论与表现的‘中国化’和‘民族形式’化这一影响很深的民族主义命题”。^④ 如果说这些学者

①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

② [澳]尼克·奈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王应一译，《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③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香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3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只是从学术角度作出这种理解的话,那么苏联党内的一些人则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而直接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所谓“民族主义”毫无相干,给它扣上“民族主义”的大帽子,完全是在混淆视听。

3.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西方学者那里,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没有统一的称谓,有时是“毛泽东思想”,有时是“毛的思想”,有时又是“毛主义”。而且,他们往往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不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误解。

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看法比较接近实际,如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对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将其视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线索。雷蒙德·怀利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是“打开创立毛泽东思想之门的理论钥匙”,“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直接产物”。^①

但是,也有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明显背离事实的。史华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一书中,虽然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和中国化,但却认为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他说,“毛主义”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重要的核心预见”的异端。^②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联系的话,那它只是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但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③ 英国学者科拉科夫斯基断言:

^① [美]雷蒙德·怀利:《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的历史氛围》,载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2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10页。

^② [美]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191、199页。

^③ [美]本杰明·史华慈:《再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近代中国》1976年第2卷第4期。